

农 • 村 • 青 • 少 • 年 • 人 • 物 • 传 记 读 本



○ 李存光 著

巴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农村青少年人物传记读本

巴 金

李存光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 / 李存光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9

(农村青少年人物传记读本)

ISBN 7 - 5087 - 1522 - 5

I. 巴... II. 李... III. 巴金 (1904 ~ 2005) — 传记
— 青少年读物 IV. K825.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485 号

丛 书 名: 农村青少年人物传记读本

书 名: 巴金

著 者: 李存光

责任编辑: 孙晓青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 联 方 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51698 电传: (010) 66051713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故乡四川	
	(1904—1922 年)	(1)
第二章	寻求新的生活	
	(1923—1930 年)	(18)
第三章	穿越乱山碎石	
	(1931—1936 年)	(35)
第四章	在自己的岗位上	
	(1937—1949 年)	(69)
第五章	风雨之路	
	(1950—1965 年)	(95)
第六章	噩梦一场	
	(1966—1976 年)	(119)
第七章	浩荡文坛立阵头	
	(1977—1986 年)	(141)
第八章	用行动来证明	
	(1987—1998 年)	(163)

第九章 生命没有沉寂 (1999—2005 年)	(192)
尾 声 流向大海	(206)

第一章 在故乡四川

(1904—1922 年)

一

公元 1904 年 11 月 25 日,即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李姓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李家祖籍浙江嘉兴。巴金的高祖李介菴作为“幕僚”携家入川,到巴金这一辈,李家定居四川已经有五代人了。因此,成都是巴金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故乡。

巴金出生时,当过县官的曾祖父李璠已谢世二十六年,做过知县、知州的祖父李镛已闲居在家,他置了不少田产,在成都北门建了一座漂亮的公馆,现在虽垂垂老矣,仍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家之主,掌握着大家庭的命运。

李镛有六子一女,长子李道河,字子舟,即是巴金的父亲。李家虽算不上显赫的贵胄世族,但历代为官,也称得上一方名门。同当时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封建大家庭一样,李家的一切行事,都严守着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祖宗遗训。祖父和父亲为巴金取名尧棠,字芾甘,乳名(小名)升庵(即“麟”的异体字)。李家家族的辈分轮序是“道尧国治 家庆泽长 勤修德业 世守书香”。巴金父亲一辈是“道”字辈,巴金这一辈是“尧”字辈,他的同胞大哥名尧枚,三哥名尧林,二姐名尧桢,三姐名尧彩。兄弟姐妹的顺序是按大排行排列的,二哥、大姐都是二叔李道溥的孩子。

巴金的名和字,出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这是一首

颂扬周召公姬奭施惠于民的德政的民歌，全诗三节，每节都以“蔽芾甘棠”一句开头。“甘棠”即棠梨树，“蔽芾”是描绘甘棠树繁茂状貌的形容词。巴金的祖父能诗文、喜字画，曾自印过一册题为《秋棠山馆诗钞》的诗集，给子孙取名字，自然要引经据典。拆开完整的诗句，取末字“棠”为名，中间二字“芾甘”为字，于原诗的文义并不通达，但选中这一句诗，却表明祖父和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厚望。

巴金出生的成都，处长江支流岷江的中游，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中部，是一座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其名的来历，据说是沿用周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说。此城因织锦业盛，并设锦官管理，又称“锦官城”、“锦城”；因城上遍植木芙蓉，亦别称“芙蓉城”。早在公元前311年战国时代，秦惠王就在这里设县筑城；三国时期的蜀汉，五代时的前蜀、后蜀，都以此地为国都；北宋的李顺和明末的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也曾以这里为都建立“大蜀国”和“大西国”。历代诗人墨客，留下过许多诗文，咏唱这座富庶华美的历史文化名城。西晋诗人左思在他的名作《蜀都赋》中，称它“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并用“轨躅八达，里阡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这样的文句，形容其街道纵横、人口稠密的富足繁华状况。唐代诗人杜甫到成都后，感叹地称它为“喧然名都会”。宋代诗人陆游则以“濯锦江边天下稀”的诗句，表达他对这座名城的赞美。据有关资料，到清代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成都城的规模为周回二十三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这个规模大概保持了一百余年，到20世纪初也无大变化。在巴金出生的前后，成都已拥有三百余条大小街巷、二十多万人口，堪称中国西南的泱泱大城。

成都北门有一条正通顺街，东西走向，长不足一里。街的中段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公馆，这就是巴金渡过生命最初十九年的“家”。

巴金在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家》第一章末尾，这样描写高公馆的外观：

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巴金的家李公馆与作品中描写的高公馆并无二致。需要补充的是，打开油亮闪光的黑漆大门，迎面是一堵白色的照壁，“长宜子孙”四个土红色的篆字，组成一幅图案，嵌在照壁中央蓝色的圆框子里。公馆里有四进院落，几十间房屋，还有花园、竹林和许多树木。

天真烂漫的巴金在锦衣秀食之乡成都，在高墙深院的李公馆，生活了近五年时光。1909年，巴金的父亲就任广元县知县，全家离开成都，去到广元。

位于四川北部的广元，群山怀抱，人烟稀少，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苦寒山区。知县一家住在县衙内。进县衙的大门是一块空地，两旁是关犯人的监牢，中间是问案的大堂，后面是二堂、三堂、四堂，再后面有草地、桑林，整个县衙有六七进深。这在小小的穷县城里，称得上是堂皇巍峨的建筑了。李道河夫妇和孩子们的居室在三堂，孩子们的活动天地也就在他们眼中显得十分宽阔的县衙内。

白天，巴金随哥哥、姐姐一道到二堂的书房里跟着家塾先生认字、读书。放学以后，便到四堂后面的草地、桑林玩耍，拾桑果，做游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他们还养了二十几只鸡，巴金把它们当作亲密的伙伴，一一取了名字。晚上，母亲在油灯下教尧林和巴金读词，读本是母亲用娟秀的小字，亲手从舒梦兰（字白香）编选的《白香词谱》上抄下来的。这部流传很广的词集选录的历代名家之作，是巴金最初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年幼的巴金还不可

能理解这些词章深邃的意境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字，但每一首都熟记背诵。母亲教读时那柔和清朗的声音，令巴金和尧林心醉，这是他们兄弟俩在这荒寂的山区所能享受到的“唯一的音乐”。

广元的生活并不全是平静、喜悦、温馨，也有困惑、眼泪、悲哀甚至愤怒。孩子的心是好奇的，每当听到衙役们喝叫“大老爷升堂啰！”的声音时，巴金就溜出书房，跑到大堂，悄悄站在公案旁观看父亲审案。父亲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公案前，衙役们手持竹板侍立两旁，“犯人”跪在地上回答老爷的问话。“犯人”若不招供，脸色阴沉的父亲便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给我拉下去打！”两个衙役应声而上，把“犯人”按倒在地，褪下裤子，露出屁股，然后用小竹板从左右两边打下来。“犯人”哭号着大叫“冤枉”，屁股由白变红，而紫，鲜血直流。直到“犯人”表示“招供”，衙役才停止抽打。然后，衙役牵起挨过打的人，给大老爷磕头，谢恩……巴金看着这一幕幕，脑子里常常冒出疑问：为什么平时在家里很和善的父亲，审案时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什么“犯人”不招供就要挨打受刑？为什么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却要向命令打自己的人谢恩？

公堂上的事情巴金弄不明白，家里也有一些事情使他感到困惑和难过。比如，他最喜爱的大花鸡有一天被宰杀，变成了饭桌上的美味菜肴。他又伤心，又气愤，不吃一口鸡肉。他质问母亲：“为什么做了鸡，就应该被人杀来做菜吃呢？”当他明白鸡活着就是为了给人们做食物后，不仅对养鸡失去了兴趣，并对那些养肥自己，以便给人们作食料的动物，都怀有厌恶之心。又如，祖父生日的那一天，全家在广元敬神祝福，巴金却不肯磕头，因此第一次挨了母亲的鞭子，这使他感到少有的委屈。

到广元的当年，巴金的大妹妹（九妹）出生，第二年，第二个妹妹（十妹）也出世了。母亲雇了一个奶妈给十妹喂奶。当十妹出水痘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按老习惯，这期间奶妈不能随便吃食物，尤其忌讳吃鲜黄瓜之类的“发物”，但有一天奶妈在偷偷吃凉拌黄瓜时被母亲发现，结果挨了二十下皮鞭并遭辞退。巴金的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比父亲更温和善良的妈妈，总教自己要爱人、要

帮助人并且不许自己打骂仆婢的妈妈,为什么也做出这种残酷的事情呢!

照料巴金和尧林生活起居的女仆杨嫂的遭遇,更给巴金留下了深深的感伤。三十多岁的杨嫂是一个寡妇,在李家做了四年佣人,又跟着他们一家从成都来到广元。杨嫂干活勤快利落,口才也好,会讲许多很好听的故事。这个能做会说的杨嫂却生病了。巴金和三哥尧林偷偷跑到三堂后边的平房去看过一次病中的杨嫂。房内阴暗发臭,杨嫂躺在床上,乱发飘蓬,脸色惨白,双手又瘦又黄,说话有气无力,不久,缺少照顾的杨嫂神经错乱,凄惨地死去了。这是巴金懂事以来死去的第一个他最接近、最熟悉的人。再也看不到勤快的杨嫂那高高的身影了,再也听不见会讲故事的杨嫂那悦耳的声音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永远消失了。这就是死!它使巴金感到可怕,可怖。年幼的巴金第一次朦胧地知道了什么是“死”,感受到“死”的悲哀的含义。

公堂上和家中看到的鞭打、受刑、眼泪、哭号、死亡,都与“爱”相矛盾。直觉告诉巴金幼小的心灵:并不是一切的人都能随时得到爱,也不是一切的人都始终给别人以爱。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时隐时现、时弱时强的疑团,常常在他的脑中盘旋。

二

正当巴金在广元过着幼年时代最特殊的一段生活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大事。1911年6月,为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四川人民奋起抗争,组织了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保路运动风起云涌。9月8日,保路同志会武装起义,包围省会成都。25日,荣县同盟会以“保路”为口号起义,一举成功,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荣县军政府。荣县起义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革命运动,并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

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这一年初秋,也许是感到清王朝已朝不保夕,也许是心仪革命运动,也许是不愿在这苦寒山区久留,巴金的父亲李道河辞去了知县的官职,

带全家回到阔别两年的成都。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月25日,成都宣告独立,随后成立了大汉军政府。巴金的父亲带领孩子们用碗口、杯口印制图案为十八圈的新国旗。但是,军政府成立才十二天,成都就发生了一场兵变。变兵抢劫银行、银号、捐号、票号,以及繁华街道上的商号、当铺,乃至一些大公馆、大住宅,闹得偌大个成都城鸡犬不宁,户户自危。巴金的父亲忙着埋藏银圆和其他贵重物品。母亲带着不满七岁的巴金和除大哥尧枚以外的其他孩子,躲到外祖母家。起初呆在房内,后来听到外面的哭闹声和枪声,担心不安全又爬过围墙,在墙外菜园的茅棚里坐了一夜。当晚,正通顺街家中真的冲进十来个变兵,由于有十几个堂勇和三叔从南充带来的镖客持枪以待,家里才免遭洗劫,只“借”给变兵一百圆银元了事。这场持续了半天一夜的兵变和洗劫,使全城关门闭户,人心惶惶。第二天(夏历10月19日)本是巴金和他的母亲的生日,但心神不定的家人却忘了这件事,也无心顾及这件事了。这场难忘的惊骇,使年幼的巴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直接感受到社会动乱给普通人带来的忧虑苦难和不幸。

回到成都以后,已经懂事的巴金常常同哥哥、姐姐以及同辈的堂姐妹、表兄弟们聚会,做各种游戏,拍皮球,踢毽子,掷大观园图,逢年过节,还行各种酒令助兴。除了玩耍,当然还得读书。巴金同三哥尧林一起上家塾,在先生的强迫下,不仅读“四书”、“五经”,还熟读了许多其他诗文,特别熟悉《古文观止》中的二百多篇散文。《红楼梦》是家里的大人们都读过的书,巴金常常听长辈们谈论,因此,熟知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唐诗、宋词、晚清小说和先秦以来的各体散文,这些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成了最早浇灌巴金心灵之花的精神养料。

巴金在公馆里受到的最初的教育,主要来自母亲陈淑芬。母亲作为大家庭的长房长媳,是一个温和宽厚的贤妻良母。“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这就是巴金在追忆中描绘的母亲肖像。在荒僻的广元时,母亲自然是巴金幼小的世界的

中心。回成都后,长辈、亲人多了,活动的天地更广了,但巴金最依恋、最敬重的人仍然是母亲。巴金后来把母亲称作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先生”。母亲对巴金的言传身教主要是“爱”。巴金说:“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絮絮教诲巴金兄弟“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力图让孩子们懂得为人立身处世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深深地植在巴金幼小的心中。它对巴金的影响主要在于推己及人。巴金还说:“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性格的根柢。”

在大家庭中,母亲允许孩子到轿夫、仆人、厨子这些“下人”中去。这样,巴金得以经常同“下人”们谈天说地,玩耍嬉戏,以至“下人”们成了什么事都不对他隐瞒的亲密朋友。与“下人”的交往,使巴金在大公馆的高墙深院中,除了花厅、书房、卧室、花园,除了祖父、父母、叔婶、胞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以外,还有了另外一个迥然异趣的环境,这就是“下人”和他们生活的马房、门房、厨房。

在狭小的马房、在寒冷的门房和烟熏的厨房,巴金常常听到病弱的轿夫、衰老的仆人叙说自己辛酸的经历,倾诉自己绝望的胸怀。他还亲眼看到这些人惨苦的遭遇:有的因偷了主人的字画被赶出门外,沦为乞丐而死;有的病死门房,身子瘦得像一捆干柴;有的被诬陷“盗窃”,在大门内上吊自杀……这一切,开阔着巴金的眼界,使他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社会”;除了锦衣秀食、养尊处优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外,还有许多劳作不息、身份低贱、经历坎坷并且受穷、受饿、受苦的人。使他知道大地上并不都是明媚的阳光,还有沉沉的黑暗;生活中并不都是温馨的爱,还有苦难、辛酸、不平和憎恨。当少年巴金听到、看到“下人”的困苦处境和悲惨遭遇时,他深怀同情,“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从心底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

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从那些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干瘦羸弱的劳动者身上，少年巴金感受到了劳动者忠厚、正直、爽朗的品格。饱经艰辛的轿夫老周是“下人”中对巴金最有影响的一个人。这个备受生活薄待的老人孤身独处，妻子早离开他跟别人跑了，儿子当兵又死于战场。他不懂得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不憎恨社会，而以自己的生活信念执著地活着。有一次，巴金帮他烧火，老周指着熊熊燃烧的灶膛对他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说的是烧火的窍门，也道出了做人的态度。他还对巴金说过：“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老周的话语，深深地刻在了少年巴金的心上。二十年以后，巴金成人并成了作家，还深情地把这个倔强而执著的轿夫称为自己幼年时的“先生”，并认为他所说的“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老周告诫的为人要“真实”、“忠心”，成了巴金毕生生活信念的两个基石，成了他律己待人的长鸣警钟。

1914年巴金十岁的时候，母亲生病去世了。从小沉浸在母爱中的巴金，受到从未有过的打击。尽管一年以后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对他们兄弟也很好，但却不能治愈他心上的伤痕，他仍感到悲哀和孤独。母亲去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两年半以后，父亲又去世了。这更增添了巴金的沉重和空虚。就在父亲去世前后，1917年4月和7月，巴金还经历了两次战乱之苦。4月的第一次巷战是川军与滇军之战，连续七天枪声不绝，血流街巷，巴金二叔的两个儿子却在这时患白喉症，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都死了。战事刚平，巴金和尧林也染上白喉，所幸的是治愈了。7月的第二次巷战更为激烈，川军和黔军互相攻击，全城硝烟弥漫，火光四起，血流得更多，人死得更多，最后黔军溃败，总司令戴戡自戕，战事才告一段落。这两次战乱的恐惧，作为一种残酷可怖的景象，深深留存在巴金的脑海之中。

双亲的相继去世，身边的战乱不已，人间的“爱”是这样少，疾

病和残杀不断夺去亲近的和陌生的人的生命,这使巴金更加忧伤惆怅。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这时更向书本寻求慰藉。他在家中找到《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传》等旧小说,一一读过。此后两三年中,巴金还从大哥那里看到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说部丛书》。这些书是大哥向当律师的二叔借来的。这部丛书1903年开始印行,是本世纪初中国最大、最完备的一套翻译小说文库。丛书的选材虽良莠不齐,但包容了托尔斯泰、小仲马、大仲马、狄更斯、莎士比亚、司各特、欧文、易卜生、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斯蒂文森、里德、斯托夫人、巴尔扎克、雨果等世界各国的许多名家名著。这几百种翻译小说在巴金面前展开了一个斑斓的世界,使他看到了域外种种奇异的人物、世相和思想。整日埋头读书,广泛浏览古今中外的小说,不仅使巴金受到多方面的文学陶冶,也逐渐造就了他忧郁而倔强的内向性格和善观察、好思索的习惯。这性格和习惯在巴金的一生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父亲去世以后,二十岁的大哥尧枚挑起了巴金一房的生活担子。相貌清秀、自幼聪慧的尧枚大巴金七岁,是大家族的长房长孙,祖父指望他尽早传宗接代、兴家立业,因此,当他中学毕业时,就由家庭包办结了婚。新娘不是他爱着的那位姑娘,而是由父亲在祖宗的神主面前拈纸团决定的。大哥顺从地接受了长辈的安排。接着,父亲让他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做职员。尽管尧枚在中学毕业时考试名列第一,满怀着到上海或北京的大学继续深造,甚至去德国留学的愿望,但他性格软弱,不敢违背祖父和父亲的意旨,只好走家庭为自己安排的道路。父亲去世后,尧枚掌管着在全家举足轻重的长房的家务,少不了要应付各处袭来的非难和攻击,应付大家庭中理不清的种种矛盾,但他总是委曲求全,一味忍让、敷衍。他想寻求平静,内心又十分痛苦,因此得了神经病,不时在深夜独自坐进停在大厅的轿子里,打碎轿窗的玻璃。巴金常常责备大哥的暮气和软弱苟且,同时又对他的处境感到不平 and 痛苦。从大哥身上,巴金自觉不自觉地看到一条可怕又可悲的路。

在父亲去世前,巴金的三哥尧林已进了中学,看到哥哥在新

学校里吸收新知,巴金又高兴又羡慕,但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好运。由于祖父从来就不赞成子弟进新学校,在尧林入学后,祖父反对再送子弟入新学校,因此,已经十三岁的巴金只能在家中利用晚上的时间,跟在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表哥濮季云学英语。直到1918年秋天,他才进入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学习。祖父不反对巴金上补习学校学英文,并非思想有了开化,而是因为他听说懂英文可以进邮局工作,而这工作不仅薪水高,位置也稳固。可惜巴金身体不好,只上了一个月的课便因病辍学,此后,只得仍在家中跟表哥学习。

大家庭内部的冲突、不幸和自己的忧郁,使少年巴金觉得这个高墙围着的“家”像一团阴影,罩在自己的头上,像一座囚笼,关住了自己渴望自由发展的心。他恨家中“主人”们的虚伪、做作,恨封建礼教的专制和对青年人的压制,恨目睹耳闻的欺凌、压迫和不义,恨一切恶势力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童年不是黄金时代,它是萌芽的时期,在那时候绿叶正从一棵生命的树上生长出来。那些伴着春天来到人间的嫩绿的新叶,我爱它,看见它们一天天地发育成长,我就想到那茂盛繁荣的将来。

这是1932年巴金在《童年》中写的一段话。巴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他生命的萌芽期,它的确不全是美好灿烂的“黄金时代”。其中,有爱,也有恨;有欢笑,也有泪水;有舒畅,也有困惑;有幸福,也有忧伤。但这毕竟是一个欢乐大于愁苦、依恋重于诅咒的时期。在微风细雨之中,巴金那生命中新绿的树叶正在坚强的生命之树上发育,成长……

三

1919年,中国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这场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仅

对于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也培养了整整一代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献身的新人。六十年后,七十五岁的巴金以充沛的激情写道:“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五四前后,以上海、北京为中心出版的新报新刊风起云涌,流向全国各地,也源源流入四川省会成都和另一个大城市重庆,以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县。五四运动发生后,各报竞相报道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巴金曾这样记述他们兄弟当时争阅新报刊的情形: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

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

当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新报、新刊、新书似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新思想的宣传，如狂飙骤起，声势浩大。学生请愿、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关心和参与国事的种种举动此起彼伏，的确见所未见；“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消灭专制制度”、“社会主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汇聚而成的时代之声，沸沸扬扬，的确闻所未闻。这一切，强烈地吸引着、震撼着被长期禁锢在大黑屋内的巴金。好像黑屋子的墙上打开了无数窗户，他振奋地看到一幕幕从未见过的景象，深感觉别有洞天，他呼吸到一股股新鲜清爽的空气，胸中畅快无比。各种破旧立新的“文字”，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脑子，“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他的热情，那有着巨大理性精神和强烈感情色彩的讨伐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议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世界，我有点惊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心胸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新思想、新学说使少年巴金明白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现存制度是一切祸害弊端的根源，应该推翻它，改造它；明白了世间分为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地主和养活他们的工人、农民两个营垒；明白了人生下来必须劳动，自己的上一辈靠剥削、掠夺为生，是有罪的，自己不能再过寄生的生活，也不应像许多前辈人那样走一条出世、成长、保身、传种以至死亡的路，而应当过一种新的生活。